

杂花生树

高光出平湖

□ 曹剑龙

天底下有一种蛋，壳是软的，却跟缺钙没半点关系。它不仅不病态，反倒很金贵，金贵到曾进过乾隆爷的御膳房，拿过无数金牌，被誉为“天下第一蛋”。它叫平湖糟蛋。

心里吊着这只蛋，我专程去了一趟平湖。平湖地处浙北，东临上海，南濒杭州湾。江南小城的模样，水多、桥多。辖区内广陈镇上，一桥联接沪浙两地的山塘老街，近年被人“发现”后，引来无数游客。

可我此行心念念的首站，不在老街，而在糟蛋非遗展示馆。早在1999年，平湖“龙牌糟蛋”就获评“中华老字号”，制作工艺还被列入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展示馆中西结合、不大不小，一进门，酒香就扑了过来。不是烈酒的冲辣，是糯米酒那种醇厚绵长的甜香，丝丝缕缕往鼻子里钻。隔着库房的玻璃窗，看见一坛一坛储存的糟蛋，像期待揭开红头巾的新娘。

跟着讲解员，在另一处展厅里，又看了分别卧在白瓷碟里的糟蛋们。膏脂般的胶冻裹着一团橘红，蛋壳已经不见踪影，只剩一层薄得透光的膜，颤巍巍的，吹弹欲破，惹人怜爱。

这蛋的来历，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。清雍正年间，平湖城西河滩，有个酒坊老板叫徐源源。那年黄梅天，雨水漫进了酒坊，水退之后收拾残局，无意间发现角落的酒坛裂了缝，里头竟埋着几只鸭蛋。捞出来一尝，酒香裹着蛋香，咸中带甜，真是无心插柳之喜。徐源源是个有心人，反复试验，把这门手艺琢磨透了。到了光绪年间，“徐源源糟坊”正式开张，这款意外得来的糟蛋，从此成了平湖的一张脸面。

那天，展示馆里有老师傅现场演示。最绝的一步叫“击蛋”，拿竹片对准鸭蛋大头轻击两下，小头再来一下。壳破，膜不破。轻了，酒糟进不去；重了，蛋液横流。新学徒光练这一手，少说也得半年。我盯着老师傅的

手看，竹片在指尖翻飞，“笃笃”数下，蛋已入坛。“清明前后封进去，中秋前后开坛，”他拍拍坛子，“等酒糟里的东西慢慢渗进去，蛋壳自己就化掉了，急不得。”

从馆里出来，当地的朋友说，走，再带你去看看平湖人是怎么种菜吧。我起初不以为然，谁知进了镇里的农业开发区，眼界大开。这里种菜不用土，用沙子；不靠人工，靠数据。一排排芹菜齐刷刷长在沙槽里，大棚里的传感器实时监测温湿度，电脑自动浇水施肥。另一处更奇——机械臂在轨道上来回跑，自动移栽菜苗、检测虫害，生菜长在层层架子上，底下是循环流动的营养液。伸手

触摸叶片，鲜嫩饱满，仿佛已经尝到了那份清甜。

两种平湖在我眼前，变幻交错。一边是传承三百年的老手艺，靠经验、靠手感、靠“急不得”；一边是高科技迅猛发展的现代农业，例如数字大棚，靠数据、靠算法、靠“快而准”。做糟蛋的老师傅和种菜的技术员，一个守着泥封的坛子，一个盯着闪烁的屏幕，干的却是同一件事，把一只蛋、一棵菜，做到极致。

离开平湖那天，买了两瓶糟蛋。我思绪万千。其实好些事情，慢一点，笨一点，也许反倒能做成。就像那只酒坛里偶然落进的鸭蛋，在沉默的时光中，等待脱胎换骨。



莫氏庄园 宋 帅 作

镌刻在灵魂的迷彩岁月

□ 王春卫

在岁月的长河中，那些军旅岁月如繁星闪烁，虽历经风雨，却依旧璀璨人间。

1992年12月15日的深夜，平湖籍的107名热血青年，怀着对未来的憧憬与志忘，踏上了开往广西的军用列车。嘉兴站的月台上，满是前来送行的家人和亲友。火车启动的刹那，哭声如潮水般涌起，那是亲情与故乡的羁绊。三十个小时的漫长旅途后，我们抵达了广西贵港。

军车在广袤的原野上疾驰，帐篷外，寒风如刀，黑夜似墨，唯有车灯射出的光束，在孤寂中倔强地划开黑暗，却也照不清那未知的远方。火车长时间的颠簸，让大家疲惫不堪，不一会儿，便都东倒西歪地睡去。

“下车，下车，到部队了！”不知沉睡了多久，睡梦中的我被这呼喊声惊醒。揉着惺忪的睡眼，背起行囊，跌跌撞撞地下了车厢。眼前，就是一个巨大的操场，比故乡生产队的晒谷场宽阔无数倍。太阳灯高悬，那强烈而刺眼的光线，将操场照得亮如白昼。一位军官，皮鞋踏地，发出“咔咔”的声响，朝我们走来。

“十个人一组，一百米冲刺，跑得快的去好连队。”军官的声音冷峻而威严，指挥着这一场关乎命运的选拔。

我怀揣着梦想与家人嘱托，在心底暗暗发誓，定要拼尽全力。出门前，父母那股切的目光与声声嘱咐，犹在耳畔：在部队好好干，争取早日入党。于是，我紧咬牙关，告诉自己，一定要去那好连队。

“各就位，预备——跑！”口令落下，伙伴们如脱缰之马，奋勇向前。那一刻，疲惫、饥饿与一路的艰辛都被抛诸脑后，唯有对好连队的向往，对未来的憧憬，支撑着我们飞奔的脚步。每组取前三，我却不幸跑了第四，失落如阴霾般笼罩心头。同组的阿黄和阿强，两位平湖籍的战友，光荣地入选“好连队”。那是全师的标兵连，亦是全军的王牌连队，听闻其训练之严苛，令人心生敬畏。

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，不甘与酸楚在心底翻涌。不知从何处涌起一股勇气，我举起手，高呼：“我高中毕业，我也要上好连队！”那声音，在空旷中回荡，带着几分执拗与恳切。众人投来异样的目光，军官却未予理会。我缓缓地，将那高高举起的手，偷偷缩了回来。最终，我与嘉善的小房被分到了某团三营七连。

班长说，在我们到来之前，部队从未招过浙江兵。我们是第一批，身在异乡军营，小房便成了我的慰藉。

一日清晨，新兵三班正在军体训练。文书匆匆跑来，问道：“谁是浙江兵？”

“报告，我是！”我挺胸而立，高声应答。“赶紧回连队，连长找你。”文书的语气急促而凝重。

连长找我？心中满是疑惑。新兵平日与排长接触较多，连长的身影，总是那般威严而遥远。

“昨天拉练，小房从山上摔了下来，现在在野战医院救治！”连长的叹息声中，透着无奈与关切。

“团里指示，要连队派一名老乡陪同，你赶紧收拾一下去医院吧。”连长的催促，让我来不及多想，使使命感油然而生。

病房里，小房静静地睡着。上午九点的阳光，透过窗户，温柔地洒在他消瘦而憔悴的脸庞。白色的绷带缠绕着脑袋，头发凌乱如杂草。那件泥浆与血迹混杂、已摔烂的作训服，被扔在墙角，似在无声地诉说着昨日的惊险。

刹那间，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，内心如被利刃穿刺，疼痛难忍。此刻，病床上的小房，已不再是那个来自邻县的陌生同乡，而是我的兄弟，我的亲人，是那血浓于水的战友深情。我赶忙询问病情，医生告知：“他已无大碍，只是脑袋磕了个大口子，还有点轻微脑震荡，以后会留下疤痕。”

从医院回来的路上，我想了很多。小房是幸运的，但部队的每一天都在提醒你——稍有不慎，代价可能就是血的教训。除了意外，在所有教训中，最让人不敢触碰的，是纠察那条红线。

在部队里，违反条令条例，若是被班长逮到，不过是做个检查。但若是在营区外违反，被纠察抓到，那可就惨了。

曾有隔壁二营的一名战友，因在营区外仪容不整、未按规定佩戴军帽，被纠察查处。依规受到严肃惩戒，加练训练科目，他痛苦的表情至今仍印刻在我的脑海，成为我们心中严守纪律的警示。

所以，班长告诫我们，在外面遇到纠察赶紧跑。新兵每日训练，体能充沛，跑得飞快，纠察难以追上。我将班长的话铭记于心。

一个周末的夜晚，我与战友张治从连队出来，欲前往部队前的土坡散步。一周的训练过后，这周末的夜晚，显得格外轻松惬意。路过土坡上的一所中学时，里面锣鼓喧天，热闹非凡。我们走近一看，一群年轻的男女学生正在载歌载舞，表演文艺节目。

我们停下脚步，沉浸在这欢乐的氛围中。然而，片刻之后，身后传来呼喊：“纠察来了！”我回头望去，只见两个戴红袖箍的纠察，扔下自行车，朝我们飞奔而来。

“张治，快跑！”我大喊一声，如离弦之箭般向前冲去。因过于紧张，我未留意到前方是池塘，扑通一声，失足落水。

纠察仍在身后紧追不舍，我狼狈地爬上岸，继续狂奔。前方是学校的围墙，我已无路可退。绝望之际，我突然想起新兵时所学的科目——翻越障碍墙。

“对呀！我不是会翻障碍墙吗？”念头一闪，我一个箭步跨出，身子前倾，双手撑住墙头，奋力一跃，登上了两米多高的围墙。

“新兵，算你狠，下次别让我逮住你！”纠察见无法逮住我，气得破口大骂，而后无奈离去。

连长将张治从纠察队领了回来。

“张治你怎么不跑？”我问道。

“没法跑，我穿的是拖鞋！”张治苦笑着回答，眼神中满是懊恼。

阿东，与我同属一个营的平湖籍新兵，在七连后面的九连。因距离相近，且脾性相投，我们关系甚笃。

阿东的父亲担忧儿子在部队吃苦，给他寄来五百元钱。阿东回信说，部队待遇尚好，津贴费颇为可观，让家里无需挂念，不必再寄钱。

实则，新兵每月津贴费仅21元，除去日常用品开销，想要吃一碗5元钱的螺蛳粉都极为不易。阿东是为了不让父母忧心，才出此“善意的谎言”。

彼时，我正欲调动至北方部队，中途要回老家一趟，阿东便托我去探望他的父母，并将钱捎回去。

“去时一定要穿军装，让爸爸妈妈看到你，就像见到我一样。”临行前，阿东的叮嘱，饱含着对家人的思念与牵挂。

跨越千山万水，我终于回到故乡，辗转找到了阿东家。炎炎夏日，阿东的父亲头戴草帽，手持铁锹，在屋前的自留地里辛勤劳作。

“叔叔，我是阿东的战友，从广西回来！”我高声自我介绍。

自留地里，阿东的父亲愣了许久，才缓过神来。他如被电击般丢下手中铁锹，快步朝我跑来，朝着屋内呼喊：“孩子他妈，儿子的战友来了！”

阿东的母亲从里屋走出，看到我，仿佛看到了久别归家的儿子，激动得难以言表。她眼眶泛红，嘴唇微微颤抖，那双手紧紧握着我，仿佛害怕一松手我就会消失不见，她的目光在我的军装上反复游走，似在寻找着儿子的影子，刹那间，泪水夺眶而出。

“穿上军装，让爸爸妈妈看到你，就像看到我一样。”阿东的嘱托，此刻化作一股暖流，流淌在我们心间。我深知，我的到来，能为这两位思念儿子的老人，带去一丝慰藉。

阿东家的后墙上，挂着一幅中国地图。那地图，看似普通，却因地图下方某个地方，用红笔画着的一个醒目五角星，而显得与众不同。我心中满是好奇，欲探究竟。

阿东的父亲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，缓缓说道：“画五角星的地方，是儿子部队所在之处——贵港。我和他妈每日都会看这地图一会儿，就如同见到孩子一样。”

站在阿东家地图前，望着那颗代表贵港的五角星，我深知，过往的军旅经历已化作灵魂的坐标。其间的汗水与欢笑，离别与重逢，彰显着军人于家庭和国家间的无悔抉择。军人的脊梁，因亲情的温暖、国家的重托而挺直。我将以这些难忘的过往为指引，铭记战友深情，不负亲人牵挂，胸怀对祖国山河的挚爱，于岁月的长河里，矢志不渝地秉持军人信念，砥砺前行，续写那属于军人的荣耀与担当，让军绿之光，长照心途。

感念师恩

□ 顾永华

我生命中最宝贵的那叶帆，1988年在新埭中学轻轻扬起。

郑冠炼老师教我们语文，有一双含笑的眼睛，说话带着温州口音，不疾不徐，像屋檐下的雨线，绵绵的，却有沁人心脾的力量。在他的组织下，我们几个藏着文学梦的年轻人聚到一起，成立了“扬帆文学社”，郑老师选我当了第一任社长。

第一次社团活动，郑冠炼老师带我们去拜访了平湖籍作家詹政伟老师。他说：“文学不是闭门造车，要去看看走在前面的人。”坐在詹老师满是书香的客厅里，听他讲述创作的甘苦与寂寞，那光环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有风雨也有晴岚的道路。一粒名为“文学”的种子，悄然落入心田。

第二次社团活动，郑冠炼老师带我们赴乍浦探寻孙中山先生“东方大港”的百年构想。站在历史遗迹上，海风猎猎，郑老师说：“好的文字，要扎根泥土。我们平湖的泥土，一样能长出参天的文学之树。”那一刻，我仿佛看见种子扎根故土的根须。

1989年夏天，我们去乍浦陈山采访驻军官兵。看到整洁的营房、训练场上的汗水，听到嘹亮的口号。一位十九岁的小战士说，最大的愿望是退伍后回乡当语文老师，一边说着，一边腼腆地搓着手。郑冠炼老师说：“这位战士的梦想，不就是最动人的诗篇吗？”午后，我们到英雄纪念碑前献花，郑老师又语重心长地教导：“写作者不仅要记录生活的美好，更要铭记历史的厚重。”这次活动，让我们第一次感受到文字背后的重量。

郑冠炼老师还鼓励我们参加影评比赛。几篇稚嫩的文章，被贴在电影院门口的橱窗里，玻璃后面那张薄薄的稿纸，忽然就有了分量。每次路过，我总要放慢脚步，瞥见自己的名字印在铅字里，明明只是油印的方块字，却觉得那三个字格外熠熠生辉。那种羞涩与骄傲，比考了满分还让人心跳加速。

最让我们有归属感的，是社刊。当时还没有电脑和打印机，由油印室刻蜡纸，再用老油印机推印。满屋油墨气息，那是青春

与梦想最真切的味道。粗糙的社刊分发到各班，鼓舞难以言喻。郑冠炼老师像虔诚的守望者，守护着我们最初、或许也是最笨拙的表述。

郑老师还常带我们探访新埭古桥。太平桥和青云桥建于乾隆年间，桥身楹联依稀可辨。他领我们解读：“‘人钟题柱前程远，家益平川利济长’，我们的先人，早把对土地的感情刻进石头里。”他俯身拂去石栏尘土，让我第一次懂得什么叫文化敬畏。

毕业后，扬帆文学社薪火相传。学弟学妹与新埭文化站合作创办了《扬帆》期刊。1992年中秋，文学社与文化馆举办联谊晚会，全镇文学爱好者齐聚，诗歌朗诵、散文分享、即兴创作此起彼伏，郑冠炼老师坐在角落，眼中满是欣慰。

高中时光倏忽而过，我们各奔东西。我未以写作为生，做过许多工作，但夜深人静时总不自觉地提笔。郑老师说过：“文学的意义，不在于让你成为作家，而在于让你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。”当年种下的，更像一点“酵母”，在岁月深处静静发酵，让我平凡的一生有了诗意。

2025年10月2日，我们几位同学赶赴温州永嘉探望病重的郑老师。他消瘦得让人心疼，双眼虽已失明，听觉却异常敏锐，竟能捕捉到我们的脚步声，努力坐起来，一一询问近况。我们得知，郑老师退休后视力日渐衰退，他凭凭大镜整理出版了《永嘉山人文集》《布衣人生》；双目失明后，还靠口述完成了一些作品。即便在黑暗中，他也没放弃对文学的热爱。

临走时，郑老师轻声道：“安康是最重要的。”那声音很慢，很轻，却重重落在我心上。不曾想这竟是最后一面。10月8日，郑老师安然辞世。

泪水模糊中，仿佛又回到那间老教室，郑老师正拿着我们的社刊，一字一句地品评，嘴角挂着那抹熟悉的、鼓励的微笑。当年的社员已散作满天星辰。我们终究没有辜负那叶从新埭中学扬起的风帆，也没有辜负郑老师当年那句“文学是让人成为完整的人”的期许。

云端之上

□ 曹海兵

拉萨的清晨还浸在薄薄的凉意里。九座商务车驶出市区，沿着雅鲁藏布江河谷一路向南，窗外的色调渐渐从城镇的灰蒙过渡到高原的苍黄，山体裸露着岩石的肌理，偶尔几从高原柳在风里摇晃。

车子沿老路翻山越岭。海拔表的数字一路往上跳。过了加若拉山口，眼前骤然一亮——羊卓雍措像一条被风揉皱的蓝丝带，蜿蜒铺展在群山之间。那片蓝得不真实的湖水，时而铺展在脚下，像一匹望不到头的蓝绸；时而又隐入山的另一侧，只在缝隙里露出一抹亮色。云层压得极低，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棉絮。车在云中穿行，前挡风玻璃上时而蒙上细密的水雾，雨刮器一下一下，眼前的风景忽而清晰，忽而迷蒙。

路边出现了一群牦牛，慢悠悠地踱过公路，对往来汽车视若无睹。在这片土地上，人才是匆匆过客。草滩上又闪过几头藏野驴，竖起耳朵，警惕地望着车子驶过，又低头啃食稀疏的草茎。老路比国道远了不止一公里，路上的景色，是走大路看不到的。天气说变就变。雨点砸下来，接着是冰雹，豆大的冰粒敲在车顶和挡风玻璃上，噼啪作响。天色迅速暗下去，能见度骤降。雾灯亮起，车速却没减多少——这种天气在山上常见。

海拔超过五千米。冰雹渐渐停了，云层裂开一道缝，金色的阳光倾泻下来，照在远处雪山山顶上，亮得刺眼。

路越来越窄，越来越颠，车身在碎石路面上剧烈摇晃。可窗外的景色却越来越壮阔——连绵的雪山在天际线上排开，像一道巨大的白色幕布，脚下是一望无际的高原草甸，枯黄中夹杂着星星点点的蓝紫色小花。

午后，车子停在一处村落前。

孩子们从教室里跑出来，站在院子里好奇地张望。教室不大，却布置得温馨，窗台上摆着手工纸花，墙上贴着彩色卡纸。孩子们的脸蛋红扑扑的，带着高原特有的红晕，眼睛却亮得像羊湖的水，干净得没有一丝杂质。

后座厢里卸下一捆捆崭新的黑色羽绒服，那是给山里孩子们带的过冬衣服。衣服一件件递到孩子们手里，在高原的阳光下显得格外厚实。孩子们起初有些拘谨，接过后却一个个咧嘴笑了，小手在衣服上摸来摸去。他们围坐在一起翻阅绘本、搭积木，用藏语叽叽喳喳地说着话，那一双双眼睛里，盛着纯粹的快乐。

另一个村子在更深的山里。车子又颠簸了近一个小时才到达。孩子们正在做手工，墙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纸花、小动物和小房子。当蜡笔和彩纸发到手里时，一个小姑娘抱着刚领到的新衣服，又用新彩纸折了一朵花，转身露出一个缺了门牙的笑容。

离开时，天已擦黑。返程走了下午抢修通车的国道，路虽平整了，车速快了起来，但一天的高度起伏还是让身体发出了抗议，太阳穴一跳一跳地疼，恶心一阵阵蹿上来。直到海拔降到四千米以下，才渐渐好转。羊湖在夜色里只剩一道模糊的轮廓，车灯照亮的路面在眼前不断延伸。脑子里反复浮现的，是孩子们怀里抱着黑色新衣的小小身影。

有些路虽然难走，却必须有人走。而路总会修通，就像冬天总会过去，孩子们总会穿上暖和的新衣服。

车子驶进拉萨市区时，已近深夜。一天的颠簸结束了，可这趟云端之上的奔赴，才刚刚在心里开始。那些在海拔五千米之上依然明亮的眼睛，就是这趟旅程最好的答案。